

游走于东西方之间：国际中文教育发展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吴英成教授访谈录

吴英成（Goh Yeng-Seng）¹，张连桥（Zhang Lianqiao）²

摘要：现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吴英成教授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先后出版了中文专著《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商务印书馆，2007）和英文专著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Singapore Perspective* 《国际汉语教学：新加坡视角》，（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其学术贡献与国际影响主要体现在汉语全球化传播理论的创新、多元语言教育模式的探索以及新加坡经验的分享三个方面对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学术研究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既为新加坡语言政策提供智库支持，又通过多语互鉴的教学模式，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从中华文明输出迈向世界文明互鉴，其思想对构建人类语言共同体具有深远意义。吴英成教授目前担任《中文教育与评价学刊》荣誉主编，本次访谈聚焦于吴英成教授在东西方之间的学思历程，旨在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吴英成；国际中文教育；东西方文化；文明互鉴

Title: Navigat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Goh Yeng-Seng

Abstract: Professor Goh Yeng-Seng, an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a faculty member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is a lea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e has authored seminal works such as the Chinese monograph *Chinese Language Globalization: A Singapore Perspective*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and the English monograph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Singapor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His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re reflected in three key areas: innovations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he exploration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models, and the sharing of Singaporean experiences, all of which hold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is research combines theoretical depth with practical relevance, providi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Singapore's language policies while promoting a shift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global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through multilingual pedagogical approaches. His ideas carry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¹ 吴英成（Goh Yeng-Seng），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际中文教学、全球汉语与汉语变体、汉英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汉英对比与翻译、华裔语言形态与身份认同、教学科技应用、教育组织管理等。电邮：yengseng.goh@gmail.com。

² 张连桥（Zhang Lianqiao）（通讯作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欧美戏剧、国际中文教育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电邮：zhanglianqiao@qq.com。

global linguistic community. Currently serving as the Honorary Editor-in-Chief of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Professor Goh Yeng-Seng shares intellectual journey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ontexts, offering insight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Goh Yeng-Se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ast-West cultures;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张连桥（以下简称张）：尊敬的吴教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2024年11月23日上午，您受邀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做专题讲座，您的讲座题目是：“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我的学思历程”。感谢缘分，让我有机会在这次讲座现场认识您。您的讲座围绕着您的学思历程展开，您乐观、热情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的采访就从您的学思历程开始如何？首先，请您谈谈，您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心路历程？您在东西方之间游走的文化体验是什么样的？

吴英成（以下简称吴）：你好，很高兴一起分享，我们就轻松地畅谈好了。上次在广州大学的讲座是应我的老朋友屈书记¹的邀请。我们一起参加11月22日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主办的“语言服务赋能企业国际化：国际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论坛”，屈书记说，吴教授一定要去我们学校给学生们讲一讲，我就与大家讲一讲“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我的学思历程”。今天的采访，我很乐意再来谈一谈我的学思历程。我很幸运的是我这一生常得到无数贵人相助，尤其是我的老师，我的国家领导，还有我的国际友人，当然还有我们国际中文教育的同行。

我父母亲是福建闽南人，但我在新加坡出生，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我的基础教育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新加坡完成。在两年半“国民服役”(National Service)后，1981年我获得新加坡政府海外奖学金，到台大中文系求学。我是台大中文系本科生，而台大对我日后学术发展影响很大。我的东方语言学基础是在台大积累的，这个扎实的学术基础对我日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汉语语言学基础，你从事这个专业就很不扎实。我在台大中文系修读的汉语语言学课程有《文字学》（龙宇纯先生授课）、《声韵学》（杜其容、何大安先生授课）、《训诂学》（张以仁先生授课），以及旁听《汉语历史语法》（梅广²先生授课）、《汉语史研究》（丁邦新³先生授课）等，这些课程对我日后的汉语本体研究影响很大。梅广老师是哈佛大学语言学博士；丁邦新先生是汉藏语言学家李方桂⁴的学生，丁先生是华盛顿大学语言学博士，他们是美国学成回台贡献的学者。

当时台大本科生不用写毕业论文，到现在也不用写毕业论文，但我主动跟曾教我《中国文学史》叶庆炳主任提出要求，并在他鼎力支持下最后成功为我特别开设“学士论文”课程，论文题目是《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我的学士论文指导老师是梅广先生，他对我的指导对我后来攻读语言学博士课程奠定扎实的汉语语言学基础。

¹ 屈哨兵，博士，教授，曾任广州大学党委书记，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国家语委国家语言服务与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研究中心（广州大学）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语言服务、汉语传播、传统文化传承等研究。主编出版国内首部语言服务研究专著《语言服务引论》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主持完成的“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高校互联网+中华经典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² 梅广（1938-2022），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出生于香港，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博士。他长期致力于汉语语法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曾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台湾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其代表作《上古汉语语法纲要》首次将生成语法理论系统应用于上古汉语研究，被视为该领域的里程碑著作。

³ 丁邦新（1936-2023），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语文系获博士。曾在台湾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任教，其著作《音韵学讲义》《丁邦新音韵学论文集》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⁴ 李方桂（1902—1987），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出生于广东广州，美国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他毕生从事印第安语、侗台（壮侗）语族以及汉语和藏语的研究，其主要论著有《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唐蕃会盟碑研究》等，在历史语言学、音韵学及语言接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

当时除了在台大中文系修课以外，我还到外文系和人类学系选修语言学课程。我在外文系修读的课程有《语义学》（黄宣范¹先生授课）、《汉语方言学》（黄宣范先生授课）、《语言学概论》（郑恒雄²先生授课）、《中英语言比较》（郑恒雄先生授课）等，这对我日后学术发展很重要。既向东方语言学学习，也向西方语言学学习，日后我才能游走于东西方之间。郑恒雄老师开设的《中英语言比较》对我日后从事国际中文教学影响很大。英语是我的二语，郑恒雄老师告诉我，“我们学习英语的问题不是英语的问题，而是中文的问题。”我们学英语的时候，英语是我们的二语，我们的主导语是中文，我们会无意识的用中文去学英文，而要解决这个二语学习问题就必须知道中文跟英语的细微区别。换句话说，如果你有意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一定要开设对比语言学与翻译课程。我极力向学生推荐吕叔湘³《中国人学英语》，吕先生原是英文老师，而他的汉语语法研究内含许多中英对比分析。

我也在人类学系修读李壬癸⁴先生开设的《社会语言学》，这对我的学士论文《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我还旁听黄正德⁵先生的《变形语法》。黄正德先是乔姆斯基的学生，目前担任哈佛大学语言学系教授，我2005年到哈佛大学访学时还去旁听他的课。所以，我的东方语言学的基础在台湾打下的，这对我很重要，这是我后来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的重要学术基础。

张：谢谢吴老师，您在台大学习东方语言学，这为您之后研究国际中文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您从台大毕业后，回到新加坡做中学华语老师，您能谈谈这个阶段您的教学和研究吗？

吴：1985年台大毕业后，我回到了新加坡并在教育学院(Istitute of Education)修读一年制专业教育文凭课程。从1986年到1992年，我担任新加坡中学与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华语老师，先后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教过书：一种是以英语为家庭常用语的“传统英校”；另一种是以华语为家庭常用语的“邻里学校”；最后我到一所优秀高中担任“语文特选课程”导师。在中学执教7年期间，让我深入且全面了解不同背景的华裔学习者学习华语所面对的诸多问题。1987年，28岁的我虽然只是一位新加坡中学华语老师，却初生之犊不怕虎，只身到中国大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并发表我的国际汉语教学处女作《以克漏字测验探讨新加坡的华语教学问题》，后来收录在《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里。我至今仍记得发表论文当天北京大学朱德熙⁶先生直言批评部分与会者的论文缺失，却肯定我的国际汉语教学成果，称赞我受过良好的语言学训练，思路很开阔。28岁的后生晚学能得到中国权威汉语语法学家的鼓励，让我更坚定日后到西方国家深造的决心。1990年，我也参加“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发表题为《学生汉字偏误及其学习策略的关系》论文，也收录到《第三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里。我当年有幸结识中国

¹ 黄宣范（1943-2022）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生于台湾云林，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博士。他长期任教于台大语言学研究所，致力研究台湾南岛语、汉语方言及社会语言学。其代表作是《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在学术上融合理论分析与田野调查，兼顾学术深度与社会关怀。

² 郑恒雄（1940-2019）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生于台湾彰化，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博士。长期任教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及语言学研究所，专精南岛语系研究，尤以布农语、阿美语等台湾原住民语言分析著称。其代表作《布农语语法》首次全面建构该语言语法体系，成为原住民语言研究典范。

³ 吕叔湘（1904—1998），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江苏丹阳人。早年留学英国学习语言学，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他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语法，代表作《中国文法要略》构建了汉语语法理论体系，《现代汉语八百词》为语法工具书典范；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成为权威辞书，深刻影响汉语规范化进程。他致力于语文教育革新，参与教材编写与语言政策制定，推动汉语科学化、标准化。其治学严谨、注重实证，开创汉语研究新范式，被誉为“语言学大师”，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语文教育发展贡献卓著。

⁴ 李壬癸（1936-），中国语言学家，出生于台湾宜兰，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博士。长期致力于语言学尤其是台湾南岛语和濒危语言的研究与保护，代表作有《台湾南岛民族的族群与迁徙》等，其学术生涯以开拓冷门领域为特色，为语言学研究和文化传承作出了突出贡献。

⁵ 黄正德（1948—）国际知名语言学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8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师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专攻生成语法理论，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推动者。

⁶ 朱德熙（1920-1992），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江苏苏州人。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他以汉语语法研究为核心贡献，开创性地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推动汉语语法研究科学化，代表作《语法讲义》《语法答问》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基石。

文字、声韵、训诂、文献学家，北京大学的周祖谟¹教授，周教授不仅送我至今我还珍藏的无价墨宝，还亲笔嘱咐晚学：“如何利用其（西方语言学）学说以建设中国的语言学，以求得新的开拓，诚为当务之急。”

张：1992年，您已经在新加坡中学任教了7年，而且已经成为骨干教师，那时候为何选择要去英国留学。一般人很难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面临着诸多的风险，比如文化的差异、物质的考量、家人的意见，乃至不确定的未来，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有魄力的。您是基于什么的力量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呢？从自我投资的角度，您能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忠告吗？

吴：我一直鼓励年轻人，必须勇于追梦。如果你连梦想都不敢去想就去躺平，你就应该冷静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生命的体验。有梦想才有奋斗的动力，我们必须经常眼望星空，不时与星星进行生命意义的对话。在1992年，我在新加坡的工作高度稳定，且担任华中初级学院“语文特选课程”导师。再说，我又是公务员，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职位。如果当时不离开高度稳定的工作岗位，我可以一直在学校教书40余年，直到60岁退休。可是，我不想我的人生只是做一个中学老师。在台大求学的时候，我就梦想成为汉语语言学家。虽然已得到非常良好的东方语言学基础训练，对西方语言学也有初步认识。但是，总觉得我的语言学训练仍十分不足，自然不愿躺平，而一直想要成为真正且合格的汉语语言学家。在台大的时候，看到我的老师诸如梅广先生、黄宣范先生、郑恒雄先生、李壬癸先生等，都是留美的语言学博士，我总是扪心自问，他们能够到美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作为新加坡华校生的我，难道就不行吗？我以这样的驱动力推动我勇于圆这个梦。既然有四年的台湾语言学基础训练，又有七年参加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国际汉语教学经历，1992年对我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必须跳脱舒适圈，勇敢地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再说，我当时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总觉得既然自己有学术潜力，就应该奋力一搏，去圆这场规划多年的梦想。我当时非常清楚必须努力赚钱去投资我的人生，到西方世界攻读博士学位，圆我语言学家的梦。1985年自台大回新加坡以后，为了圆梦我就必须努力赚钱。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去当家庭教师，星期天连续三场，早上中午晚上各一场。1992年辞去新加坡教育部中学华语教师职位时，我已积蓄10万新币，足以在新加坡买一间“共管公寓”(condominium)套房。在当时看来，我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绝对是高风险的自我投资。但是，我以三成风险七成把握的“三七开原则”管控风险。换句话说，任何人想要圆梦，就必须接受可管控的三成风险。但是从今天来看，与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工作20多年的薪水相比，10万新币绝对是高回报的自我投资。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不冒风险而想获得高回报是绝对不可能的。年轻人不仅要勇于“眼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这样才能让风险降到最低，实现最大的理想。同时也要“活在当下”。过去不可追，未来不可知，当下最实在。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一天，不管是痛苦或者快乐也是一天。最后，我们还要有感恩的心。如果说我今天还有一点成就，我必须感激我的恩人，包括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在我的人生路上不时拉我一把，让我顺利圆满走到了今天。现今的年轻人无需过于悲观，只要你肯努力，在孤寂奋斗途中，一定有许多好心人助你一把，让你的生命越走越精彩。

张：谢谢吴老师的分享，您的自我投资非常成功，也非常励志。这一点我感同身受，心怀梦想，何惧未来。从1992年到1996年，您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您当时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为何会选择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学系？

吴：1992年我远赴英国，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我的导师 Jonathan Kaye,

¹ 周祖谟（1914-1995），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深耕音韵学、文字学及古籍校勘。其代表作《问学集》《广韵校本》《方言校笺》以科学方法重构中古汉语音系，系统梳理汉魏六朝方言演变，开创古籍校勘“理校法”新范式，被誉为“传统小学现代化转型的典范”。

为自己取汉名柯翰源¹，是“管辖音系学”(Government Phonology)创始人之一。经过三年八个月艰辛的研究岁月，我以他创建的“管辖音系理论”为框架，完成我的博士论文“*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Beijing Mandarin*”（《北京方言音韵成素研究》）。2000年，我把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中国著名的理论语言学学刊《当代语言学》，考察北京话音节结构的音韵问题²。

张：您觉得西方语言学研究与东方语言学研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期间有哪些特殊的经历让您印象深刻？

吴：西方语言学研究与东方语言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很不一样：第一，勇质疑。如果到西方求学，你没有办法去挑战、去质疑任何学术议题，你一定会陷入学术深渊而无法自拔。第二，重推理。比如语言学研究的三个层次：观察、描述和解释。以三声变调为例，一般讲三声变调，只停留在观察层次，两个三声在一起，前面的三声就会变成二声。美国音韵学家以公式 $3 \rightarrow 2/3$ 描述三声变调现象，把语言学研究提升至描述层次。但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提升至解释层次，解释为什么两个三声会变为二声，而不会变成一声、四声。第三，讲原创。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导师第一次在指导我时问我的第一句话：“tell me your story”（告诉我你的故事）。当时听后，我很不是滋味，觉得我这么辛苦的研究到头来只是一个故事。其实，讲自己的故事而非转述他人的故事非常重要。在英国漫长的求学经历，我的导师教会我怎么样讲自己故事，做自己原创的研究。正因如此，我经常鼓励学生活出自我，勇于讲自己的故事。

张：有意思，您在英国的留学经历十分特别，也很有趣。从英国博士毕业后，您就回到了新加坡。那可否请您谈一谈您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工作经历？

吴：1996年，我获得英国伦大博士学位，不仅圆了我追寻多年的语言学家的梦，同时也奠定我的学术根基与地位，成为学术正统派、科班出身的语言学博士。从1997年获聘为讲师进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工作，至2024年教授荣休，我在国立教育学院服务长达27年。2004年，我升等为副教授且获得长聘，隔年远赴蜚声国际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展开为期半年的西方取经之旅。在哈佛大学学术休假期间，有幸结识美国“中国通”，诸如傅高义(Eza Vogel)、陆柏彬(Robert S. Ross)、华安澜(Alan M. Wachman)等，并应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邀请，以题为“Who Are We? The China Complex of Chinese in Singapore”（“我们是谁？新加坡华人的中国结解析”）作英语专题演讲，由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孔飞力³(Philip Kuhn)教授担任讲评人。回国后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西行哈佛取经”短文，回顾我在哈佛大学访学的观察和感悟。

201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中文专著《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本书是我自1987年至2007年这二十年学术历程的回顾，也是对自己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化整理与总结。新加坡外交

¹ 柯翰源 (Jonathan Kaye, 1942–2021) 是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管辖音系学 (Government Phonology) 的创始人，其理论对现代音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柯翰源的“管辖音系理论”不仅推动了音系学与句法理论的交叉融合，也为东亚语言的音系分析提供了新视角，其学术遗产至今仍通过其学生及全球音系学界的持续探索得以延续，如中国学者马秋武、贺俊杰等进一步深化了对管辖音系学的研究，特别是贺俊杰的《管辖音系学声调理论研究——模型建构及应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该书提出了完整的管辖音系学声调理论，包括声调的表征和解释理论两大方面，回答了包括调型表征的层次要性、调型的内部结构、调型的自主性和变调音系过程的解释等基本问题。

² 吴英成 (2000)：北京话是单音节语言的质疑。《当代语言学》(04): 231-247+279。

³ 孔飞力 (Philip Alden Kuhn, 1933-2016)，美国著名汉学家，出生于英国伦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主要著作有《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其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研究方法，对历史研究影响深远。

部长杨荣文、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¹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中文部主任魏久安(Julian Wheatley)为本书撰写序言。本书以一、“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特征”二、“汉语全球化与新加坡华语的定位”三、“多语环境下新加坡主流华语教学”四、“华语教学‘新’策略”四方面进行全面且深入的论述，这四方面的问题存在紧密的内部联系，一、二两个方面关乎语言的本土认同与国际接轨的平衡，三、四两个方面有关语言教学与语言政策的探讨，这四方面基本上与本书的四章一一对应。凭借这本中文专著以及十余年在研究、教学、服务三方面取得的卓越学术成果，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大学管理层的严格审核，2011年评上了南洋理工大学正教授，荣获大学殿堂的最高荣誉。201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英文专著“*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Singapore Perspective*”，以一系列重要课题，比如汉语国际传播、汉语变体比较、新加坡语言政策与规划、汉英双语并用教学法、“老外”教汉语、科技在国际汉语教学应用、汉英双语词典编纂、国际汉语教师培养、翻译服务业等，让国际英语教学同行与英语世界的行政部门全面认识国际汉语教学现状及其相关问题。这两本专著奠定了我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标志着我已攀上国际学界高峰。此外，我在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担任了八年亚洲语言文化学部(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cademic Group)主任，分管中文系、马来文系和淡米尔语系。为推动三系同事与学生学术合作与促进新加坡跨种族语言应用，2010年与新加坡国家图书管理局(National Library Board)联合出版“*Diverse Languages, One Identity: A Guide to Conversations in the Chinese, Malay and Tamil Languages*”(《众口一心：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会话手册》)。为了把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打造成“国际中文中转站”，不仅通过“请进来”策略，陆续邀请国际中文教学专家学者诸如郭熙、魏久安、赵金铭、古川裕、周小兵等为中文系师生传经送宝，同时旨在培养有志于在汉语为非主导语言的英语系国家进行汉语教学、具有良好的双语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汉语教师，2014年推出全新的国际汉语教学硕士学位课程(Master of Art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迄今培养十届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毕业生，真正做到“桃李满天下”！

除了担任国立教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硕士、本科荣誉学位指导教授等职位外，我也受聘为同济大学国家外专、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外专、青海民族大学国家外专、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华侨大学客座教授、西南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南宁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齐齐哈尔医学院客座教授、吉林华侨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课程校外考委、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香港教育学院国际汉语文学硕士课程校外考委、新加坡新跃大学翻译课程指导委员会委员、台湾《师大学报》编审顾问、台湾《编译论丛》编辑委员会咨询委员、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南非斯坦凌布什大学现代语言系汉语课程校外评委、新加坡教育部双语并用华文教学法试验计划学术顾问等国内外公私机构学术顾问与理事、国内外大学高级学位考试委员、学报论文与出版社著作评审等职务。

张：谢谢吴老师，您的经历十分丰富。作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您的职业生涯以卓越的学术成就与跨文化实践深度融合为特色，从1997年开始，您扎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27年，从讲师晋升至正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学术根基。您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对了，您刚刚提到，您2005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您能进一步谈谈这一段经历为您带来的影响吗？

¹ 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兼任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中心主任，《语言战略研究》主编，《语言规划学研究》主编，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用系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2016年-2017年）会长等职务。出版著作《中国语言规划论》等40余部，发表论文580余篇，被译为英、法、俄、日、韩、阿拉伯及蒙、藏等多种文字。

吴：我2005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期间，也结识冯胜利¹先生、顾百里先生、魏久安先生三位美国知名国际中文教学专家学者。冯胜利先生当时是哈佛大学中文课程主任，安排我旁听初级、中级、高级中文课程，让我深入了解英语背景学习者与华裔背景学习者学习中文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蜚声国际的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在二战期间曾在哈佛大学担任美国“陆军专科训练班”(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中文部主任，专门编写 *Mandarin Primer* (《国语入门》)(Chao 1948/1964)作为汉语口语入门教材，主张“因为注重的是说话，所以全用国语罗马字的教材，只教了少数的最常用的汉字。”顾百里²先生当时是威廉学院亚洲研究系教授及系主任，邀请我到威廉学院参观访问，且安排我旁听他开设的中文基础口语课程，并在2011年出版 *Basic Spoken Chinese: A Foundation Course in Mandarin* (《中文基础：听与学》)³，遵循赵元任以拼音符号作为汉语口语语码，不使用汉字，编写中文基础口语教材。魏久安先生⁴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中文课程主任，也安排我旁听他开设的中文基础口语课程。他也遵循赵元任以拼音符号作为汉语口语语码，不使用汉字，在2010年出版 *Learning Chinese: A Foundation Course in Mandarin* (《汉语基础教材》)⁵，同年也应聘到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学部担任客座教授。顾百里与魏久安两位“老外”教汉语有其自身的优势，他们有学习汉语的切身体验，深知汉语作为二语学习的难点，非常了解英语背景学习者的特殊需求，且可以与学习者无障碍地沟通。我与中文系同事以“‘老外’教汉语：经验与启示”为题⁶，把“老外”教汉语的实际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归纳为四点：一、“先语后文：初级汉语口语教学不出现汉字”二、“考虑语别性：利用学习者第一语言作为教学资源”三、“第二语言学习者视角：语言点的处理和解释有别于主流教学”四、“师资协力组合模式：以目标语为本族语的教师和以基底语为本族语的教师优势互补”。

张：谢谢吴老师的分享，您的访学经历很有趣。您刚刚提到了您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为什么会考虑再出版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Singapore Perspective*，这两本专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吴：这是个好问题。2011年我荣获南洋理工大学正教授标志着已获得大学殿堂的最高学术荣誉，我的助理问我，我的学术人生还有什么巅峰未达到？严格来说，如果我未出版有关国际中文教学的英语专著，无法证明我已攀上国际学界巅峰。英国知名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在其经典著作，*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英语作为全球语言》) (1997, 2003, 剑桥大学出版社)指出，“一个国家的语言是否成为全球语言，与该语言内在的结构性质、词汇量大小、是否曾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书写工具、是否曾与伟大的文化或宗教联结无紧密关联，也与该语言本族语使用者人数的多寡无必然关联。”1999年我首次以全球语言为视角在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美国中文教师学报》)发表题为“Challenges of the rise of global Mandarin” (“全球汉语崛起挑战”)，参照卡奇鲁(Kachru 1985,1992)全球英语三圈模式，依据汉语全球化的传播方式、

¹ 冯胜利 (1955-)，中国知名语言学家，曾在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任教，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乾嘉理必及章黄学理、训诂学、韵律语法学、语体语法学、历时句法学、韵律文学、对外汉语教学法，主要著作有 *Prosodic Morphology in Mandarin Chinese*、《汉语韵律语法研究》等。

² 顾百里 (Cornelius C. Kubler)，现任美国威廉学院亚洲研究系史丹费尔德讲座教授及创系主任。他长期致力于汉语教学与研究，主张汉语教学应遵循“口语先行”原则，强调从高频生活词汇入手，延后生僻字教学，并倡导家庭语言环境对双语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指出早期强化口语基础能有效降低后续汉字学习难度。其理论对国际汉语教育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³ 参见 Kubler Cornelius C. (2011). *Basic Spoken Chinese: A Foundation Course in Mandarin*. Nouth Clarendon: Tuttle Publishing.

⁴ 魏久安 (Julian K. Wheatley) 是汉语教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其著作《汉语基础教材》被广泛用作汉语学习教材。魏久安的教学理念注重语言学习的系统性和文化渗透，其教材在北美汉语教育中具有重要影响，为汉语国际推广提供了规范化、科学化的教学资源。

⁵ 参见 Wheatley J K. (2010). *Learning Chinese: A Foundation Course in Mandar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⁶ 吴英成、邵洪亮、杨延宁 (2012)：“‘老外’教汉语：经验与启示”。《国际汉语》(00) 14-21+137-138。

汉语在居留地的社会语言功能、汉语语言习得类型等因素，将全球汉语分为三大同心圈，即内圈（“中原”区）、中圈（海外华人区）、外圈（外语区）。全球汉语三大同心圈与全球英语三大同心圈，即内圈（“五眼联盟”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圈（英国前殖民地区）、外圈（外语区）相比，两者唯一的差异在中圈，无独有偶新加坡正好皆处于两大全球语言同心圈的中圈，我可以新加坡为立足点探索两大全球语言的发展路径。当我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出版英文专著时，尤指出汉语是继全球英语之后最有潜力成为第二个国际通用语，剑桥大学出版社过去已经出版一系列全球英语、国际英语、世界英语等著作，理应慎重考虑出版首部“国际中文”专著。与以汉语世界读者为对象的《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相比，《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Singapore Perspective》则以英语世界读者为对象，正因如此，英语专著示例不以汉字而是以汉语拼音作为语码，这正好也因应我近年提出的国际中文教育内外双循环：中文专著为内循环市场服务，英文专著为外循环市场服务。除了考虑两专著读者对象有别以外，中英文专著在封面设计、书名、出版社、目录、辅文（序言、前言、致谢、后记）等也必须采取差异化处理。值得注意的是主流英语专著不出现邀请名人撰写序言，主流汉语专著不出现献给/纪念某人扉页，例如“In memory of the chief architect of Singapore's language policy Mr Kuan-Yew Lee 1923-2015”，“纪念新加坡语言政策总设计师李光耀（1923-2015）”。

张：谢谢吴老师的宝贵分享。从第一次听您讲座开始，我就深深地被您提携后学的博爱精神所感动。基于您的宝贵人生经历，能否请您给我们青年学者、学生提出一些学思启示吗？

吴：对青年学者、学生来说，我的忠告是做到广博与专精兼备。胡适指出：“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换句话说，做到既能博大，又能精深，两个缺一不可。我的精深是汉语语言学与国际中文教学。然而，促成汉语成为全球通用语不取决于汉语本身和中国文化，而是取决于汉语背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非语言因素。有鉴于此我们也必须能博大，不仅从事“语言学+”跨学科研究，比如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与科技、语言学与经济等，还要关注国际课题，比如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世界文明等。同时，还需要大量阅读英语语言学及其教学原文著作以及提高批评分析能力，真正做到“勇质疑、重推理、讲原创”。

我之所以答应接受采访是要与大家分享我走过的漫长孤寂学术岁月，唯有做到“眼望星空”（追寻梦想）、“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决心”三者兼备，才能达到成功的人生。幸福的人生(Ikigai)有四大支柱：一、你擅长什么？专业。二、你能得到什么报酬？职业。三、世界需要什么？使命。四、你热爱什么？热情。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家、我的职业是教授、我的使命是推动中文国际化、我的热情是学为人师。2014年，我已达到“自助圆梦”的第一人生曲线，目前正步入“助他圆梦”的第二人生曲线，衷心祝愿大家梦想成真！

张：谢谢吴老师，感谢您的宝贵分享！您的学思历程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对我们学习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有重要的意义，再次谢谢您。

吴：不客气，我也很高兴与你交流！

（采访后记：此次采访特别感谢香港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广州大学屈哨兵教授。2024年11月23日屈书记邀请吴英成教授到广州大学讲学，这才有了机会和吴教授认识。此外，在整理采访稿的过程中，对吴教授提及他的恩师和前辈，由我通过脚注的方式加以补充，在此也一并说明，敬请读者批评指正。）